

格拉謝德·巴達利亞老師

António Aresta *

格拉謝德·巴達利亞 (Graciete Batalha) 是在澳門中學服務的偉大教師隊伍中的一員¹ (這支隊伍全部由具有愛國主義參與精神，學術著作豐贍及專業造詣極高的文化人和教育人所組成)，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曼努埃爾·達席爾瓦·門德斯 (Manuel da Silva Mendes) 先生，他本人就是澳門中學的教師，同時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興趣極其廣泛的知識分子，在中國藝術品的收藏方面亦頗具造詣。正是在這些教師的幫助下，才在這個具有多元文化特點華洋雜居的社會中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澳門土生葡人社群，這一社群在葡中傳統友誼的基礎之上形成，各社群共同生活，互相尊重、理解寬容，這種多年的睿智不僅在過去存在，而且將永遠存在下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格拉謝德·巴達利亞是一九四九年八月抵達澳門的²。“我記得當我和我的丈夫抵達香港機場的時候已經累得半死。一連幾天在螺旋槳式飛機上

* 教師、研究員

1. 這些人主要有 José Gomes da Silva, António Nascimento Leitão, Carlos Borges Delgado, José da Costa Nunes, Fernando Lara Reis, Tulio Lopes Tomas, Beatriz Basto da Silva, Ana Maria Amaro,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Fernando Lima, Emilia Costa, Fernando Costa Andrade 或 Luís Gonçalves。關於這些人的活動情況可參閱 A. Nóvoa (主編) 的《教師的生活》，波爾圖出版社，1992年；或者 Ivor Goodson 和 Andy Hargreaves (出版) 的《教師的職業生活》，Falmer Press 出版社出版，倫敦，1996年。
2. 當時總督為 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ra，主教為 D. João de Deus Ramalho，而市政廳主席為 Jorge Grave Leite。澳門中學的校長是 Alberto Garcia da Silva 先生。

顛簸，經常由於發動機故障而迫降。即使是按預定計劃降落，當穿越城外的群山時也是險象環生（……）。我們終於登上了《泰來》號蒸氣船，倚在船甲板的圍欄旁，眺望著似乎漸漸離我們遠去的一排排房屋和一座座山丘。（……）蒸氣船繞著小城緩緩向內港方向駛去，從河上看城市的景色十分誘人（由於河口十分寬闊，這裡的人都稱之為大海）。岸邊，一輛小汽車緩慢地沿著花園環繞的一座座別墅行駛，像是在悠閒地散步（……）。在相互問候之後，我們全家人坐進他們的汽車來到我公婆家品茶，這是必不可少的待客程序。在那裡，我開始環顧四週的環境。交談主要使用葡萄牙語，這是自家的語言，但中間參雜著我聽不懂的漢語和英語，因為我那可憐的英語是在中學讀書時用葡語教的外語課上學來的。”³ 一次與多元文化現實的接觸就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⁴，這是一種難以認識和駕馭以及有機組織的現實。另一方面，那段時間也是被歷史的疾風暴雨蕩滌的艱難歲月。這由兩個根本性的因素造成，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眾所周知，澳門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亦陷入極度的動蕩不安之中，接受及收容了數十萬的難民，以其微薄的力量承擔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和樂善好施的責任，這是永遠難忘的，也是值得稱道的。⁵

對於一位剛剛結婚同時也是剛剛從古典語言學專業畢業的女孩子來說，遠東、中國及澳門的文化和歷史面貌究竟是怎樣的？除了賈梅士和博加熱的厄運，莫拉斯（Wenceslau de Moraes）的生活歷程，庇山耶的詩人靈感以及可能還有外交官、詩人和戲劇家安東尼奧·巴德利修（António Patrício）於一九三〇年死於赴北京途中的出其不意的噩耗之外，如果不是空談似是而非的歷史概念，我們覺得澳門遠離整個海外問題的利益中心，因此，關於這個地方的消息和資料十分貧乏。“中國，這個神奇的國家為我帶來了愛。事實上，祇有他才能把如同我這樣既無宏偉計劃也不為掙錢的葡萄牙女孩帶到這遙遠的地方。（……）假設把我最初幾年在澳門寫給家人和朋友的信件複製出來的話，如今能成為一冊厚厚的文獻，說明一個祇

3. 引自格拉謝德·巴達利亞著作《老師，你好！》，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1年，第129-132頁。

4. OECD\OCDE, “The Education of Minority Groups. An Enquiry into Problems and Practices of Fifteen Countries”, Gower, 1983年。

5. 作為補充，可參閱 António Andrade e Silva的著作《我在戰爭時期的澳門》，澳門文化司署和澳門海事博物館暨研究中心聯合出版，1991年，以及Ferreira de Castro的著作《澳門和中國》，海島市政廳雙語（葡/中文）出版，1998年。

通過賽珍珠（Pearl Buck）和皮埃爾·羅蒂（Pierre Loti）的小說瞭解東方的少女是如何突然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現實中生活的。”⁶ 幾年前，一位教師⁷以罕見的靈感揭示了一種祇有通過東方煉丹術才能獲得的精神狀態：

啊！假如我能像古時候一樣，

在月光下，

穿過鑲嵌在花園裡的湖面，

去採摘蓮葉，

讓我在蓮葉上面書寫詩句，

這些奇特而純樸的蓮葉，

將會為詩篇增添新的含意。

而我在作一個美麗的夢：

那是一本充滿馨香和色彩的書。

帶有文學精華印記的東方主義讓位予通過異國風情而獲取的某些文化表現特質，“當我來到澳門的時候，許多年都能在這裡聽到琵琶仔的歌聲。這些帶有濃重鼻音和喉音的曲調為中國人的晚宴氣氛增色。為了求得環境的片刻寧靜，我也花費不菲……；或者在澳門叫作‘喳蹦蹦’並且由中國樂師演奏的音樂，或者那種叫作‘戲劇’的中國音樂，在這些曲調中聽到的祇是震耳欲聾的打擊樂聲。”⁸ 中國的教學機構同樣值得認真研究，因為反差極其明顯：“在澳門，華人學校數目非常之多，從幼兒教育到初、高中教育應有盡有，受教育的人口非常之大。早晨八點鐘以及十一點半吃午飯的時間（華人學校的作息時間一般來說與我們的不同），所有街道上都是多如螞蟻的華人學生。這些學生身著頗具特點的藍色布裙或長褲及白色襯衣，手中拉著帶有輪子的書包或網袋。據說對於這些兒童來說，學起來繁瑣而數量眾多的書寫方塊文字要比西方兒童學習相對比較簡

6. 引自格拉謝德·巴達利亞著作《老師，你好！》，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1年，第142頁。

7. 即Maria Anna Acciaioli Tamagnini（1900-1933），澳門總督Artur Tamanini Barbosa的夫人，《蓮花》一書的作者（1925年），第二版，澳門文化司署，1991年，第15-16頁。

8. 同上，引自著作第289頁。

單的拼音文字困難得多，但我們並未發現這種情況。如果下午到貧窮的社區轉一轉，便會看到不少孩子小小年紀便在街邊練習寫字。他們坐在小凳上，一把椅子當作桌子，用在我們看來驚嘆不已的靈巧小手握著毛筆一筆一畫地學寫字。”⁹ 她對於東方的概括瞭解以及對澳門的特別認識先是逐漸通過感性接觸而得到的，後來這種認識則通過相處、閱讀、旅行、思考以及調查研究而逐漸加深。

她在尋找第一個工作的過程中認識到了澳門舊有公共行政制度的複雜性。在澳門中學的教學工作中並無她所需要的職位空缺，這足以使初來乍到的人十分沮喪。澳門的葡式教育制度本身需要進行調整¹⁰，以適應當時社會的要求。然而，一個意料不到的情況使她有了轉機，她終於找到了一個絲毫沒有思想準備的教育職業，即小學教師。

她辦理了一系列手續，並作了擔任公職的宣誓。學校管理人向她提供了隸屬於海外部編制內的初等教育教師的職位。此刻對她來說缺少的祇是她對其所提供服務的學校和班級的瞭解。讓我們引述一下她的回憶¹¹：“我們來到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即新馬路）公共汽車站對面的街口處，向右轉進入水坑尾街，再向右轉到士多紐拜斯大馬路。我們乘車進入官立伯多祿小學寬暢的校園。學校祇有一幢樓，分為兩個不同的部份。使我感觸頗深的是一個是男生部，另一個是女生部。校舍寬闊，當時還很新，窗子也很大。我已見慣了科英布拉的小學簡陋的校舍和新建的火車站，而我的姐姐曾在那裡作實習教師（正是這個姐姐在我進修數學之前曾經從那遙遠的地方對我進行了那麼多的指導），因此，這裡對我來說已經是夢幻中的豪華境界了。我小心翼翼地打開男生部的大門，從此便開始了我的教學活動。（……）”當時的校長“是一名取得拉丁語學士學位的澳門土生人，但亦像我一樣由於中學無職位空缺而屈就擔任小學教師。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沒交好運。當時澳門十分缺乏教師，但是卻祇有我們這一組人過剩。我們成了好朋友並且繼續在那裡教學，直到後來我們兩人一同轉入澳門中學。”¹²

9. 同前，引自第302頁。

10. 見新的《中等教育章程》（載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澳門政府公報》第13期）和《中葡初等及幼兒教育改革》（載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澳門政府公報》第38期）。

11. 參閱《老師，你好！》一書第71-73頁。

12. 同上，見第72頁。

這個班的學生給她的最初印象是怎麼樣的呢？“同事把我自己留給學生以後，我便開始了第一堂課。對於當時的情況我已記不太清，但我相信從此便開始教他們讀書，進行聽寫，還教一些算術。我仿佛進入一幢令人感到恐怖的房屋。我當時還不懂澳門土生孩子講的語言。他們的閱讀十分糟糕，我的里斯本發音也使他們感到困惑，他們已經習慣於聽帶有本地口音的土生教師教課。也許因為如此，在聽寫練習中錯誤百出。他們在算術課上十分逞強，似乎比教文學的老師還要高明。¹³ 第一年“是十分艱難的一年。雖然祇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但這些男孩子都是烏合之眾，幾乎個個是留級生，有些甚至留級兩、三次，劣跡斑斑。我沒有經驗面對這一切。正象所有沒有經驗的教師一樣，我對這一切感到十分害怕，我怕的是不能控制課堂紀律。我是一個嚴厲而獨斷的人，因此經常會同年紀較大的學生及搗亂的學生發生衝突。後來，我開始變得寬容起來，在課程進行的同時，讓他們不停地埋頭於各種活動之中（這是小學教師建立形象必須採用的辦法），這樣一來，課堂上再也沒有甚麼問題了。”¹⁴ 一九五零年的時候，“即我開始教學工作一年以後，我在本地傳媒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澳門兒童的語彙》，呼籲講葡語的父親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要用葡語同子女進行交流，不管其母親是否華人，也不管她們是否用自己的語言同子女說話。因為人們都知道，兒童可同時開始講兩種或更多的語言。”¹⁵

於是，她根據其教學過程中出現的意料不到的實際問題開始了對教學法的研究工作。她不僅力求克服在多元文化中產生的教育方面的挑戰（記得她當時準備向少年教授拉丁語和葡萄牙語言及文學課），而且還堅持解決教育觀及有關教學方法上出現的難題。

這是一項旗幟鮮明而大膽的工作，要冒著與所有越軌行為相聯繫的風險。同時，澳門的教育主管機構尚未設置，一位主管民事的官員根據海外部適用於所有海外殖民地的官僚主義的規範和指示進行工作。顯而易見，教育問題在公共行政格局中處於相當從屬的地位。

13. 同上，見第73頁。

14. 同上，見第74頁。

15. 參閱《葡萄牙語傳播問題》一文，發表於《澳門第一屆葡語教學研討會》，教育司出版澳門，1987年，第72頁。

格拉謝德·巴達利亞不顧僵硬規範的約束，去尋找其開展教育活動的依據和理由，開闢自己的道路。

她根據裴斯泰洛齊的教育觀點把賭注下在生動活潑的教學法及其有效性方面¹⁶，在啟發學生文化和個人動機的基礎上組織學生進行學習，在教學活動中將熱情、靈感、心理和所有其他遊戲活動結合起來。請注意這一段描述：“從前，在個人寫作課上，奧白基諾（Albertino）消極抵制，不願意寫。當我提醒他注意時，他草草寫了六七行字便到時間了。但今天他走到黑板前便表現得很好，有了興趣。以前我也曾注意到他在黑板前表現不錯，配合得很好。難道他喜歡表現自己，或者由於在家裡受到冷漠而似乎需要引起老師的注意？我盡一切力量幫助他，他是一隻需要得到善良牧羊人幫助的迷途羔羊。但對其他人呢？如果我對他過於關心，會不會忽視其他學生呢？一個教師能有多大的智慧呢？”¹⁷ 或者還有另外的辦法：“獎勵所有學習葡語優秀的學生？但這是不可能的；進行戶外活動教學以便學生能同老師就更多的話題展開交流？這是被禁止的；組織參觀以便擴展他們의思想和語彙？這又有許多問題，比如沒有時間，如下午要忙於進行體育鍛煉，道德培訓及參加葡人社會青年組織所開展的各種活動；上午是上課時間，既不允許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上帝呀，真讓我們為難啊！”¹⁸

制度上的束縛使這種生動活潑教學法的根基變得乾枯，而初等教育師資的培訓又十分薄弱，同時又不存在使教學人員將舊有知識更新為現代知識的進修機制。遠在萬里之外的海外部無力甚至根本沒有在教師的教學和學術方面進行過培訓工作。

從那時起，她便採取了一種不同於任何一種教學法理論的內部觀摹式的實踐。“為甚麼在本來似乎應該死氣沉沉的課堂上會出現如此熱烈的氣氛？因為當我還是我心目中的偉大先師維吉尼亞·熱爾桑（Virginia Gersao）的學生的時候，她就教導我要使課堂有歡樂的氣氛。她有一個小布口袋，裡面裝有從1到30一系列號碼，這些編號可寫在木製的圓形籌碼上。當叫學生回答問題時，便從中摸出一個決定運氣的籌碼。這樣做的目的是，當某一個學生被叫過後，永遠也不能斷定下一次叫到的不再是他，

16. 裴斯泰洛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教育家。

17. 參閱《老師，你好！》，同前，第62頁。

18. 同前，引自第157頁。

如果他的運氣不好的話。……我採用這個辦法好多年，我教的幾屆學生都熟悉我這個著名的小布口袋。（……）因此，我不得不向校長解釋為甚麼作這種遊戲的緣由。他笑了。可以說這是違背教學法的一種作法，而我在教學的同時不時會做出一些違背教學法的事情，這些並沒有甚麼不好。我相信這種叫學生回答問題的方法並不總是符合日常生活中所揭示的科學原理。然而我這樣做並不是說我熱衷於此事，我會很容易地改正他的錯誤。我所感興趣的是他們可以從中學到某些事情。”¹⁹ 一些老學生至今仍記得格拉謝德·巴達利亞老師的品質。據建築師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回憶²⁰，“格拉謝德·巴達利亞老師以嚴厲著稱，但她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她頗有名望，因為她是一位優秀教師。（……）她真正是一位出色的教師和研究人員。”法蒂瑪·山度士·費雷拉（Fátima Santos Ferreira）做了更為準確的概括：“她很嚴厲，但我認為她實際上是一位很好的老師，並且是學生的好朋友。她給人的第一印象似乎很嚴肅並且有些不好說話，但同時她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十分親近並同我們相處得很好。在課堂上，她似乎同我們很疏遠，甚至令人害怕，但在課後就完全變成另外一種樣子了。我覺得所有學生都喜歡她，而她也確實是經常同我一起參加課外活動的老師。實際上她具有與學生打成一片的天才。”²¹ 約瑟·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José Manuel Rodrigues）談到另一個側面：“另一位使我喜歡閱讀並熱愛葡萄牙文學的好老師就是格拉謝德·巴達利亞老師。我寧願相信是她在我進入高等學府之前對我青年時期的培養提供了更多的幫助。”²² 現任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局長的韋思理（Luiz Viseu）先生說：“格拉謝德·巴達利亞老師嚴格要求、講究方式、耐心誘導的教學方法對我印象極深。由於她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所以她能輕而易舉地發現母語不是葡語的學生在學習中的困難。”²³ 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數不勝數。然而，學生們會清楚地區分她在擔任教師和從事研究工作的過程中在人格方面易動感情的一面和善解人意的一面。

19. 同前，引自第180-181頁。

20. 參閱Fernando Costa Andrade（主編）的著作《回憶和見證》，教育暨青年司出版，1999年，第66頁。

21. 同上，引自第159頁。

22. 同上，引自第286頁。

23. 同前，引自第365頁。

考慮到她所處環境的特殊性，她堅持知識更新的想法，因此不斷要求完善自己亦是其關注的問題：“當我去葡萄牙的時候，就找受過培訓的稱職教師交談。但是，……文學課不包括在內，我在這方面的交談不會花費太多時間。在葡國教葡語和在澳門教葡語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在所有情況中，具有共同性毛病的班級對我來說並不難駕馭。這些我完全瞭解，就像我多年來瞭解需要我多花費精力的方面一樣，比如動詞變位，句子搭配，冠詞使用，人稱形式等所有與漢語完全不同的方面，這需要從幼兒時期起就進行訓練。但是，那些既有以葡語為母語的葡國和澳門土生學生（對於這些學生來說最大的問題是書寫中的錯誤，錯誤之多令人吃驚），又有以葡語作為外語的學生的班級對我來說就是十分頭痛的事。無論在這裡還是在那裡，沒有任何人能拿出解決這一問題的靈丹妙藥……。然而這種情況應該在每個有使用當地語言學生的海外省都存在。可是誰又能在這種情況下想到對在海外教葡語的教師給予特別的關心呢？”²⁴

對於格拉謝德·巴達利亞來說，開展研究一直是她從事的教學工作中理所當然的組成部份，因此它具有對生動教學法進行調節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教學和科研同時進行就是很自然的了。在語言研究和方言研究方面，她作出了極大努力並且佔用了她大量的課餘時間。“我閱讀了雷特·瓦斯貢塞羅斯（Leite de Vasconcelos）及其他人關於澳門克里奧語而寫的著作，但這已經有所不同。更為不同的是中年人所講的語言，比如我的婆婆。我必須煞費腦筋集中精力逐字逐句地去聽她講話，去分析她所用的形容詞和名詞前面的限定詞以及十分混亂的性數關係（如將Aquele camisa do Armando說成Armando aquele camisa）等等。但是對於這些我還能不費甚麼力氣就能聽懂。對於孩子和青年所使用的語言就越發令人頭痛了。我的公公不是這樣，他講的葡語很標準，只不過有一些不太明顯的地方口音。但是他的妻子、兒子和兒媳在這方面就很難作到交談自如了。於是我開始收集資料用於將來的研究，因為我注意到在葡萄牙關於澳門地方語的資料幾乎都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些年長的表姐對我的研究興趣十分吃驚但也很理解，或許由於她們曾經說過覺得我這個人很和藹熱情。於是，她們從一開始就接受我進行一些小規模的語言調查問卷工作，儘管她們承認她們已經不會講她們的母親或者祖母講的馬基斯它（makista）語言了。但是，由於

24. 參閱《老師，你好！》，第153頁。

她們一直在上海生活，遠離澳門語言發展演變的環境，所以她們的所謂澳門語仍顯得十分典型。（……）”²⁵ 就這樣她從一九七一年起便陸續在當時由曼努埃爾·巴伊瓦·波萊歐（Manuel de Paiva Boleo）教授主編的科英布拉大學《葡萄牙語言學雜誌》上發表了內容特別的研究文章。²⁶ 正如生活中常發生的那樣，沒有醜惡便沒有美好：“但是，這些工作使我遭受多少帶有敵意的責難！說甚麼古老的方言行將就木，而正是憑著這種語言才在這片土地上很好地建立起人道觀念；現在怎麼能白紙黑字地說人民缺乏教養，特別是把矛頭實實在在地指向青少年，說他們很少講葡萄牙語。這已經不是在搞科學研究，這是在有意嘲弄挖苦澳門土生葡人。然而，由於我沒有放棄，我的工作終於被外界所接受，人們終於理解我了。如今，我已經是一名為了認識澳門……同時也為了那些在信函中、在文章裡甚至在報刊上對我攻擊的那些人而付出一切的小有名氣的語言學研究者……”²⁷

在諸多擔憂之中，是葡萄牙語在澳門以及在東方的存在和地位促使她堅持長期進行研究工作。

作為個人隱私，她在日記中寫道：“由於現在沒有任何人研究澳門土生人使用的克里奧語，由於我小心而謹慎地開展這項工作，僅限於我自己的範圍，保持低調，因而我在《語言學雜誌》發表的文章似乎祇在國外得到肯定。在葡國的情況就不得而知，我沒有看到任何人發表意見。也許是由於‘本地薑不辣’的緣故吧……。我這裡保留一封漢考克（Hancock）和埃德加·波洛梅（Edgar C. Polome）的來信，他們兩人都是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的教授，信中邀請我擔任即將發行出版的《克里奧語研究學報》的‘編輯顧問’和出版委員會成員。（……）在此之前，我已經就此事收到一封非正式函件，中指出另外一些擔任‘編輯顧問’的人，其中有些是我通過閱讀他們的作品或信函而知道的學者，包括基思·惠儂（Keith Whinnom）和馬里厄斯·沃克霍夫（Marius Walkhoff）。我曾給後者用英文寫過一封信，而他卻用純正的葡文給我回了一封信。另外還有瓊·賴內克（John

25. 同前，引自第134-135頁。

26. 主要文章有《澳門方言詞彙·語言學、人種學和民俗學註釋》，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第二版，1988年，共338頁；《澳門方言詞彙補遺》，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88年，共85頁。

27. 參閱《老師，你好！》，第112-113頁。

Reinecke) 等人。而我是其中唯一的葡萄牙人。這也難怪，因為很少有葡萄牙的語言學家去研究我們的克里奧語，特別是東方的克里奧語。”²⁸

實際上，作為歷史遺產，葡萄牙語極有可能在廣泛分佈的地緣政治地區經過本地化後得以保存。這些地區從果阿、達曼、帝烏直到日本，中間經過香港、馬六甲、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或者中國。葡萄牙語局限於很小的社群及其後裔，其結構古老繼而逐漸被方言化。它有其繼續流傳的特別方式，因為它已變為一種保證社群安全的語言，在與居住國同一性完全不同的社群中可通過使用這種語言保持自身的神秘性和優越感。在筆者看來，這種語言能夠長期在那裡存在有著其深刻的原因。格拉謝德·巴達利亞還增加了人文因素，即人的因素：“我們所看到的同時也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儘管葡萄牙在那裡的存在已徹底結束，但對於曾同我們共同生活過的人民來說，雖然我們沒有在他們中間進行殖民活動，但我們在他們精神中留下的印記似乎有些東西得到永存。對於這些東西很難作出界定，是一種依戀？一種記憶？還是某位馬六甲的葡萄牙人為其曾使用過的一個詞語來解釋的那種感情，即一種思念？……”。²⁹

尚有許多計劃有待完成，因為要求總是多於人類所擁有的時間：“我不願再談我曾想在澳門寫些甚麼或者關於澳門寫些甚麼，夢想總是由於別人認為更為重要的工作而得到拖延。比如現在我想要集中精力組織出版一部澳門土生文學專輯，這是我長期以來的願望，也是總督向我提出來的明確要求。但是，一天天過去了，我還是不能開始這項工作。我要閱讀手中的一些東西，要作出一些記錄，要到圖書館查閱一些文獻進行研究，我知道那裡有許多有用的東西。我沒有時間。不，我不能屈服於這些。一旦可能，我將努力從各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中解脫出來，將這些事讓給那些像我一樣或者比我更能夠勝任並且願意擔任這些職務的人。”³⁰事實上，這部專輯從來沒有納入計劃階段。奇怪的是雖然這部文集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文化價值，但沒有任何人敢於冒險出版這部既包含葡萄牙成份又包含中國成份的澳門土生人文學專輯。

28. 同上，第 234-235 頁。

29. 《葡萄牙語在遠東地區的前景》，載於《葡萄牙在遠東地區的存在》，澳門文化司署，1986年，第 70 頁。

30. 參閱《斯托拉，你好！》，第 241 頁。

在澳門的教育史中，格拉謝德·巴達利亞老師理所當然地佔有突出位置。她的生動教學法和她的研究工作對於瞭解在澳門與中國文化的根共存了幾個世紀的葡萄牙文化的根來說有著不可估量的參考作用。通過她的著作，我們可以在今天重溫葡萄牙在澳門的教育史，有些甚至是令人驚異的瑣碎然而確實的事，也可以瞭解澳門本身的歷史，各種情節忽而在這裡出現，忽而在那裡出現，展現出一幕幕鮮明而生動的歷史場景。

格拉謝德·巴達利亞的許多同事和學生曾經工作或學習過的澳門葡文學校應該負責組織出版一部格拉謝德·巴達利亞的作品專輯，以向這位研究者表示敬意並且將其學術工作的重要方面廣為宣傳。

附錄

這裡有相隔差不多半個世紀的兩首詩歌。

第一首詩《最後一堂課》描寫的是孫女（一位畢業的學生）和祖父（中學）之間的對話。這是一首優秀的傳統校園詩。第二首《澳門，你要去哪兒？》是用澳門古老的葡萄牙語寫成的詩歌，對未來表現出某種擔憂而焦慮的情緒。兩首詩歌標定了不同的校園生活歷程以及其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亦藉此構成了其思想軌跡的一個側面。

這是在科英布拉瑪麗婭公主中學（Infanta D. Maria）1942 / 1943學年七年級的告別儀式上朗誦的一首詩：

最後一堂課

誰不認識這位先生？
一位上了年紀的學者，
整日陷入書本之中，
面孔陰沉，嚴厲而倔強。
有個孫女是他的學生，
整日使他感到頭腦發漲，
由於她頑皮不羈，

學者不喜歡她如此放蕩。
然而他今天來上最後一堂課，
心中不免有些惆悵
因為孫女在生活中要開始新的遠航。

她蹣跚來遲，氣喘噓噓，
急匆匆走進教室，神色慌張，
帶著滿面污漬，
卻故作鎮靜，好像沒事一樣。

“爺爺，你好！”

她說話時微笑堆在臉上。

“你看那金色的早晨，
天氣多麼晴朗！
能不能今天放個假
好讓我心情舒暢？”

學者默不出聲，
似乎在專心致志地
處理緊急情況。

他掏出一副眼鏡，
對著孫女的臉龐，
從下巴看到額頭，
一點點仔細打量。

他終於用陰沉的語調說：

“這裡有胭脂和唇膏，
休想躲過我的目光！”
女孩兒立刻感到侷促不安，
用手絹擦去臉上的脂粉，面色紅漲。
雖然小心翼翼，仔細修飾，
但擦拭後更加怪模怪樣：

“天哪，簡直像死屍還陽！”

“喂，我的孩子！
開始聽課吧。
但你要告訴我，你究竟願不願學習向上？”

孫女輕聲嚙囁：“我的生活就是這樣，
我…，我…，也就是說……”

“我知道，是去看電影，
是炫耀新的裙子和衣裳，
是你說過的出去曬曬太陽！”

“可是，爺爺，是誰告訴你的？
我知道爺爺是千里眼，順風耳，
但這樣的細節你都知道…
是誰告訴你
我去博物館遊蕩？”

“我……
在巴伊沙看到一切……”

“那又怎樣？”

“所以我推斷：

根據那股霉味……

孩子！”爺爺生氣地說：

“對於你來說，

祇喜歡霉味不喜歡花香！”

“老頭子怎麼這樣倔強！”

孫女向他喊道，

對老人很不敬仰。

“你這孩子太任性！”

氣鼓鼓的學者說。

“你不願學習任何東西，

你沒有任何理想，

你想通過考試嗎？！

我可以這麼對你講：

如果你能及格，

我可以在這裡割掉我的頸項

我在講台上還發現，

你有時假裝聽講，

可總是在胡思亂想，

一旦我打斷你的夢境，

你對我的提問總是舌結目瞠。

你應當知道，爺爺十分喜歡聽，
回答問題準確流暢！

“現在你突然要離去，
我提幾點忠告為你將來著想。”

“這更好，我再也不用受你的氣了。”

女孩小聲嘟囔，

卻又裝作惜別的模样。

“你要去點燃新的理想，
天天向上……”

然而這時，

下課鈴聲突然鳴響。

孫女就要

永遠離開祖父身旁。

可是，

孫女突然開始抽泣。

“你怎麼哭了？我……”

“爺爺，我為對不起你而感到悲傷！”

兩人緊緊擁抱，悲喜交加，

心情激蕩！

孫女十分罕見地對祖父

充滿感情地講：

“無論如何，在我心中，

已蒙上一層思念的憂傷；
一星希望的火花，
已在我靈魂深處發出光亮……”

“未來的生活對我將會怎樣？
是春天燦爛的陽光，
是鮮花的馨香，
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還是月光下的夜晚，充滿憂傷？ …
如果不在這裡留給你一點點
我的希望和夢想，
我怎能就此離開你身旁？”

“不要再提起我如何頑皮，
我也要忘記那苦澀的以往，
祇有感激和思念，
才能被我帶到他鄉……”

下面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澳門中學教師組織的一次紀念活動上朗誦的一首詩。這次活動贊揚了她的一生和她的工作，同時也紀念她教學生涯的結束。

澳門，你要去哪兒？

澳門，你要去哪兒？
你明天會怎樣？

你已不屬於葡萄牙，
也不屬於中國……

澳門是中國的，
馬交曾是葡萄牙人的。
然而在我的故鄉，
哪裡是我立足的地方？

被遺棄的澳門兒女，
有母親的孤兒，於是……
我的同胞在無聲啜泣，
不知將來會如何……

被遺棄的澳門兒女……，
明天對我將會怎樣？

生平簡介

格拉謝德·阿戈斯蒂紐·諾蓋拉 (Graciete Agostinho Nogueira)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出生於萊里亞 (Leiria) 市，其父母分別為若瑟·諾蓋拉·茹尼奧 (José Nogueira Junior) 和瑪麗婭·吉列米娜·諾蓋拉 (Maria Guilhermina Nogueira)。

她的中學學業先後在萊里亞 (羅德里格斯·羅勃中學) 和科英布拉 (瑪麗婭公主中學) 完成。隨後，進入科英布拉大學文學系學習，於一九四九年取得古典語言學學士學位。同年，與剛剛畢業的醫生、澳門土生人青年若瑟·馬爾科斯·巴達利亞 (José Marcos Batalha) 喜結良緣，雙雙回到澳門，從此採用丈夫姓氏。

來到澳門後，由於當時的官立澳門中學無其教授專業的職位，便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擔任官立小學的教師。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大學教授葡萄牙語課程。後來，她的大部份教學生涯是在殷皇子官立中學度過的，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才結束，在此期間她還在初等師範學校授課，並於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間擔任核校校長。

作為教師、教學法研究者、演講學者、語言學家、雜文作者和出版者，格拉謝德·巴達利亞是澳門當代文化領域最為優秀的葡籍人士之一。

她曾擔任澳門立法委員會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和澳門總督諮詢委員會委員。

她曾榮獲皇家級國家勳章（1973年）和文化功績勳章（1984年）。於一九九一年獲得東方葡萄牙學會頒發的庇山耶獎。她還是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員。於一九九二年去世。

她曾為澳門報刊（主要有《澳門消息報》、《號角報》、《馬賽克雜誌》、《賈梅士博物院學報》、《澳門商報》、《教育雜誌》、《文化雜誌》、《融和》、《澳門雜誌》、《澳門報》、《澳門教區學報》）和葡萄牙報刊（主要有《Biblos》、《葡萄牙語言學雜誌》、《消息報》、《人民報》、《信使報》等）撰寫了許多重要文章。推動出版各種著作並為其作序。在電台和電視台不少節目中作客串嘉賓。她還組織過許多校際活動，如音樂會、比賽、話劇匯演等等。

她遺作頗多（其中包括值得匯集成冊的尚未發表的的許多手稿），通過這些著作可以發現她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始終伴隨著她的教學生涯。這些著作主要有：

《想起中世紀的古老歌謠》（1950）

《向特謝拉·德巴斯科阿埃斯致敬》（1951）

《澳門土生人語彙》（1953）

《澳門土生人句法》（1953）

《根據現代批評看賈梅士的抒情靈感》（1954）

《茹里奧·迪尼斯作品中的女人》（1956）

- 《澳門地名解釋》（1958）
- 《澳門的語言：過去和現在》（1958）
- 《澳門土生葡人方言現狀》（1959）
- 《韓素音的著作和歐亞裔學者》（1961）
- 《澳門方言和菲律賓島嶼西班牙方言巧合之處研究》（1961）
- 《日本掠影》（1963）
- 《馬來亞對澳門土生葡人方言的作用》（1965）
- 《澳門民俗》（1968）
- 《吉爾·維森特的文學教育和人文體驗》（1969）
- 《諷刺大師賈梅士》（1972）
- 《澳門土生葡人方言詞彙》（1977）
- 《馬尼拉掠影》（1978）
- 《賈梅士在今日果阿》（1980）
- 《波萊歐在馬六甲的語言調查：神父的領地及其葡萄牙居民》（1981）
- 《葡萄牙語言和文化在果阿：現狀》（1982）
- 《源於葡國的葡萄牙語和克里奧語在東亞的現狀和前景：澳門、香港、馬六甲、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1985）
- 《馬六甲：神父的領地及其葡萄牙居民》（1986）
- 《青年人的智慧》（1986）
- 《讀庇山耶的詩》（1986）
- 《葡萄牙語在遠東的前景》（1986）
- 《澳門這個名稱》（1987）
- 《澳門的傳統詩歌》（1987）
- 《澳門土生葡人方言詞彙補遺》（1988）

《老師，你好！一位女教師在澳門的日記》（1991）

《世紀之旅和澳門作家》（1991）

《澳門土生葡人廚藝：返璞歸真》（1992）

上述部份著作已被譯成英文及中文。關於她的著作有一本書名為《格拉謝德·巴達利亞》的作品目錄，對於著作的出版情況有詳細而準確的介紹，該目錄由澳門文化司署於一九九五年出版。關於其擔任教師所從事的各種活動詳見於費爾南多·科斯塔·安德拉德（Fernando Costa Andrade）主編的《回憶和見證》，該書由前澳門教育暨青年司於一九九九年出版。